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马丁·范布伦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马丁·范布伦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朝

马丁·范布伦

全名：Martin Van Buren

绰号：金德胡克的红狐狸、小魔术师

生卒：1782. 12. 5—1862. 7. 24

任期：1837. 3. 4—1841. 3. 4

出身：农场主

学历：专科（金德胡克学院）

职业：律师、政府官员

党派：民主党

宗教：荷兰改革宗

职务：国务卿、副总统

夫人：汉娜·胡斯

子女：4子

名言：在这个国家，舆论是一种力量，为了它我感谢上帝：因为舆论是一切力量中最正直和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会容忍一个无能和卑劣的人用他的软弱或邪恶的双手执掌他的同胞们的生命和财产。

虽然马丁·范布伦是安德鲁·杰克逊慎重选择的政治继承人，但他的性格却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范本伦基本是个乐观、快活、易笑的人，他的魅力、礼貌和优雅的举止使他成为聚会场合极受欢迎的人。然而，在政治上，他宁愿让其他人谈论具体的问题，而不是陈述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总是设法引出别人的看法，对他自己的见解却守口如瓶，他获得了“用隐藏起来的桨划向目标”的狡猾信徒的名声。范布伦还善于幕后操纵，政治手腕非常高明，因而别人又送给他两个颇含贬义的绰号“金德胡克的红狐狸”和“小魔术师”。范布伦缺乏“老山核桃”的那种才能，没有赢得广大民众对他本人和他政策的支持。然而范布伦有特别与众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连续担任了美国参议员、纽约州州长、国务卿、副总统、总统等一系列职务。

美国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即1837年的经济大恐慌，使范布伦的声望一落千丈。但是，责任并不在于他——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也有同样不幸的经历。

马丁·范布伦身材不高，身高约5英尺6英寸，但体格健壮。说话急促，发音有力，据说在激动时会不知不觉地带出一点荷兰口音。衣着讲究，他的整洁的外表往往是报纸嘲弄的对象。

他的政敌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曾总结了范布伦的特征，直言不讳地指出：

“范布伦在许多方面都和麦迪逊先生非常相似，他们都沉着冷静，态度娴雅，平易近人，性情温厚，治事小心谨慎。但是麦迪逊没有他那种曲意逢迎、阿谀谄媚、弄虚作假、口是心非的作风。”

一、酒馆堂馆 年轻律师

1782年12月5日，范布伦出生于纽约州的金德胡克。他的命名用的是其祖父马丁·范布伦的名字。范布伦是第一位出生在美国国土、而不是英国移民的美国总统。他有荷兰人的血统，长大以后荷兰话讲得比英语好。1631年，他的曾祖父科内利乌斯·马森作为契约雇工从荷兰海尔德兰省的比尔马尔森移居至现纽约州奥尔巴尼附近。在美国，他在登记时将他出生的村子比尔马尔森错写成布伦—马尔森，他的子女因此而用范布伦作为姓氏。

范布伦的父亲亚伯拉罕·范布伦是个农场主，拥有少量奴隶，在纽约州的金德胡克开设一家酒馆。他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和后来的杰斐逊共和党人。范布伦的母亲玛丽亚·霍斯·范艾伦·范布伦是约翰奈斯·范艾伦的遗孀。他们共生了3个孩子。范艾伦死后，她于1776年嫁给亚伯拉罕·范布伦。他们婚后共有5个子女，范布伦排行第三。

范布伦在纽约州的金德胡克荷兰人聚居点长大成人。他从小受到欧洲习俗的熏陶。他的家人在家中都讲荷兰语。范布伦在当地一所校舍破旧、光线暗淡的学校学习基础课程，后来短暂地在金德胡克学校学习拉丁语。尽管范布伦家并非一贫如洗，但也是较为贫困的。未来的总统小时候被称作“小蒲包”，他得在放学后递送物品，或者在他父亲的酒馆中帮忙。范布伦酒馆是路过律师和政治家们乐于歇脚的一个地方，包括竞争对手艾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少年范布伦津津有味地倾听在酒馆

中进行的政治性谈话。他清楚地注意到了，他的父亲总是对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中立。但是在私下里，亚伯拉罕·范布伦是一个强烈的反联邦党人，他的儿子后来也分享了他的政治哲学。

范布伦在 14 岁前结束正规教育，从 14 岁起在著名联邦主义者律师弗朗西斯·西尔威斯特设在金德胡克的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除了阅读法律著作，他的学徒义务还包括打扫房子，照管壁炉和抄写文件。但是，他很快就显示出法律辩论的天资，在 15 岁时获准当着他的第一个陪审团的面综述一个常规案件，范布伦在西尔威斯特手下学了 6 年，还学到了讲究衣着的爱好。接着，他又在威廉·范内斯的纽约市律师事务所当了最后一年学徒工；范内斯是艾伦·伯尔的政治助手。1803 年，当他 20 岁时，范布伦取得律师资格，被律师公会接纳。

范布伦于 1803 年加入纽约州律师公会后，与他的同母异父兄长詹姆斯·范艾伦一起在金德胡克开业执行律师业务。1808 年，他接替同母异父兄长就任第一个公职——纽约州哥伦比亚特区遗嘱检验法官，但于 1813 年因党派性原因被解职。

二、壮年丧妻 终未再娶

1807 年 2 月 21 日，24 岁的马丁·范布伦与他的青梅竹马的恋人、23 岁的汉娜·霍斯结婚，婚礼在位于卡茨基尔的新娘的姐姐家中举行。汉娜·霍斯出生于 1783 年 3 月 8 日，是农场主的女儿，也是范布伦母亲玛丽·霍斯的远房表亲。汉娜·霍斯与范布伦在纽约州金德胡克的学校是同班同学。与范布伦一样，她也是在一个荷兰家庭长大的，一直保留着明显的荷兰口音。范布

伦深爱他那羞怯的、蓝眼睛的新娘。不幸的是，在结婚 10 年后，范布伦夫人染上肺结核病。她于 1819 年 2 月 5 日去世，享年 35 岁。范布伦没有再娶。

但是，根据广为流传又从未得到本人证实的说法，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外孙女埃伦·伦道夫于 1825 年嫁给波士顿的约瑟夫·库利奇之前，范布伦谨慎地追求过她，有些人说是向她求过婚。当时范布伦是一名中年美国参议员，而她才二十五六岁。范布伦对这类事情向来守口如瓶。在回忆录中，他只是把伦道夫小姐说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年轻小姐……和我的亲密朋友。”

1851 年，68 岁的范布伦向玛格丽特·西尔威斯特求婚；半个世纪以前，他曾在她的父亲弗朗西斯·西尔威斯特手下学习法律。尽管前总统的注目使她感到高兴，40 岁的她还是回绝了。她说，她已独身了这么些年，打算继续这么过下去。他们俩仍然是朋友。

马丁·范布伦和汉娜·霍斯·范布伦共有 4 个儿子。他们的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是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在西部边疆服役，是他父亲的秘书，后来在墨西哥战争中当指挥官。另一个儿子约翰当了一任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马丁·范布伦的长子的最大特点，也许就是没有特点。亚伯拉罕整日埋头于尽力满足和适应父亲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好像他简直就没有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模式贯穿了他的一生，从来没有打破过。人们只知道，他童年时候是他父亲的儿子；而在成年以后，则主要是他的妻子安吉莉卡的丈夫。

亚伯拉罕 16 岁进入西点军校，1827 年以美国陆军少尉的军衔毕业。他被派到一个步兵团，在国境线上服务了不到两年。

他干了5年才升为中尉，而提升为上尉则足足用了9年，考虑到父亲的尊贵地位，应该说他提升的速度是很慢的。1837年他父亲成为美国总统，亚伯拉罕辞去军职，成为父亲的秘书。

是多莉·麦迪逊把亚伯拉罕介绍给自己的表妹——美丽而又多才多艺的安吉莉卡·辛格尔顿的。亚伯拉罕于1838年和他结了婚。安吉莉卡是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富豪家族的继承人，她蔑视流俗传统，为自己挣得了一个活泼好动的名声。在范布伦的总统任期内，安吉莉卡充当着白富美女主人的角色，她以自己的妄自尊大的神气在华盛顿社交界引起了混乱。

1846年，墨西哥战争爆发，亚伯拉罕被任命为少校，他积极地参与了从瓦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城进军的战役。不久，鉴于他的服役情况，他被提升为中校。同时受到提升的还有罗伯特·E·李，他后来在美国内战中指挥了南部各州的军队。亚伯拉罕在军队里服役了整整18年，直到1854年才退役。

退役后，他和安吉莉卡由于举止优雅、殷勤好客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声誉。就在范布伦夫妇表面上完全是为了追求社会荣耀而耗费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事实上，亚伯拉罕正忙于编辑和出版马丁·范布伦的著作。

有人说亚伯拉罕：“他与弟弟‘王子’约翰截然不同。约翰很像他父亲，把自己的伙伴当成向上爬的梯子，一旦上到高处，就把梯子踢到一边，在摒弃从前帮助过自己的人问题上，从来没有任何踌躇顾忌”。而亚伯拉罕不但没把梯子踢到一边，恰恰相反，他在一生中对他父亲和弟弟在行事上都好像一座“可靠的基础”。

约翰·范布伦是所有的总统子女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他的

一生留下了许多越轨行为的记录，也留下了许多光辉成就的记录。他事业的追随者和诋毁者的数量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假如他不是那么讨厌艰苦工作，并且对担任公职有更大的抱负的话，约翰·范布伦也许可能取得和他父亲并驾齐驱的成就呢。

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风度翩翩，行为举止毫无虚饰。然而这位总统之子却被同时代人刻划成奢侈、鲁莽，声名狼藉但又才华横溢。他决定要享尽生活之乐，因此，他把个人的喜好放在高于发展自己潜力的位置。

他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进入成年时期的，那时候的年轻绅士们就是希望在酗酒、赌搏、调情上一展才华，约翰在以上领域中的表现无疑是达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并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约翰在十八、九岁从耶鲁大学毕业，继而到纽约州的奥尔巴尼进一步学习法律，他刚满 20 岁就通过了在纽约取得律师资格的考试。他没有马上开始搞法律业务，因为这时他父亲被选定为英国公使，约翰作为美国使团秘书陪父亲赴任。约翰很喜欢欧洲贵族们那种优雅的生活，他被那里的上流社会接受了。就在这初次旅居欧洲的期间，约翰发展了同欧洲各国上层有影响人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培育。

在欧洲生活两年以后，约翰回到奥尔巴尼，在那里开了一个法律事务所。最初这个法律事务所办得很成功，十分赚钱。但是他在大学时养成了一些坏习惯，这些习惯包括酗酒和赌博，没有多久，这些坏习惯就露了马脚。约翰日益荒唐的消息传到他父亲的耳朵里，他父亲到 1837 年已经是美国总统了。总统给儿子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你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天真无邪的享乐，但是为了转变它在公众舆论中的坏印象，你要为此花费多

年时间。”他进一步指出，“有人告诉我，由于比赛喝酒，你曾经两次醉得不省人事。”他父亲认为，要想使约翰改邪归正，必须使他有新习惯并且和杰出的人物来往。于是，他建议约翰到伦敦去度假，约翰对此大喜过望。

为了要使约翰在伦敦走上正路，马丁·范布伦请前总统杰克逊给威灵顿公爵写介绍信。这位公爵是英国滑铁卢战役中的英雄。杰克逊满足了这个要求。于是约翰经过这位拿破仑的征服者的引见，转而被介绍成欧洲社会中的最堪称精华的人物。正是这种优越感，常给他在热爱平等的美国带来种种的麻烦。在一次社交活动中，约翰的名字出现在来客名单上，他的名字以这样的形式排列在一些皇室的头衔、称呼之间：“约翰·范布伦，美国总统之子。”这在美国报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美国众议院议员起立“痛斥这种公然背弃平等理想的行为，正是为了平等的理想，开国的先辈们才开展了反对英国的战斗的”。从此以后，在笑话里，约翰·范布伦作为“约翰王子”而在美国人民之中变得尽人皆知。

尽管报界大唱反调，但是约翰在他的选民中进行了一些扎实的政治活动，并且在1841年5月开始的任期内被选进了美国国会。和他一起被选为众议员的人中，有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有很快就要成为总统的米勒德·菲尔莫尔；还有约翰·罗斯福，他是一位总统的爷爷，又是另一位总统的叔祖。尽管使他名扬四海的事情中也包括他的好酒贪杯，但也是正是由于他在豪饮方面的才能，约翰一再被选入众议院。有些人评论说：“约翰·范布伦是个粗人，专与粗人为伍。”但是这样的评论在政治竞争中对于他却毫无所伤。在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奴隶

制问题上，约翰支持他的北方同僚们，他断言道：“我以十分厌恶的心情看待这种买卖活人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发表公开的声明来支持废除奴隶制，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宪的。更有甚者，尽管他十分憎恶奴隶制度，但是他并不支持亚伯拉罕·林肯的总统令，却竟然去支持这个州的右翼候选人约翰·布雷肯里奇，这个人也是民主党南方派的提名候选人。

在约翰的法律业务中，办的最著名的案子是福雷斯特第五·福雷斯特案（1851—1852年）这是一桩令人十分厌恶的离婚诉讼。诉讼双方干出的在婚姻上互不忠诚的肮脏行为的细节，成了各报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并且大大推进了约翰的法律业务。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约翰是一个病弱者。为了恢复健康，同时也是为了再看一看那些留下了愉快记忆的地方，1866年，约翰出国旅行。在返回的旅途中，约翰在他唯一的孩子陪同下，搭乘斯科舍号海轮。但是他再也没有能够看一眼美国，因为他在完全肾衰竭的折磨之下死于海上。

约翰·范布伦，作为一位美国总统之子，在他的有生之年，实际上被人们称为“皇子”。由于他在体魄上精神上的特点，也由于他有各种必要的关系，约翰是拥有获得极高成就、甚至是总统宝座的全部条件的，然而他在抱负上、在自我要求上还缺乏某种东西，终于使他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他选择了享受品尝人间乐趣而非以自己的理想塑造世界的道路。

小马丁·范布伦，被亲友们叫作麦特，他一生都为人稳重、谨慎。他在马丁·范布伦任总统期间，一直作为他父亲的秘书。无疑，他绝不是一个会引起与之相识的人的爱、憎的人物。

有人形容他颇有书生气，从外表看，他绝不是一个精力充

沛、体魄强壮的人物。麦特在其父的一些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范布伦早就想写的范布伦传。然而，到 1849 年秋天，麦特那本来就很不好的身体情况进一步老化，使他成了一个重病缠身的人。虽然生着重病，他仍然保持着与他父亲的很多朋友的广泛的通信联系。

他那位 70 岁的老父亲对儿子的健康十分忧虑。他终于劝说垂危的麦特去求助于英国和瑞典的那些欧洲名医，同时寄希望于法国和德国的海水浴，矿泉浴能够给人的康复以力量——但是这些都枉然。“马丁·范布伦曾经自夸，他是第一位生于美国国旗下的美国总统，但是小马丁·范布伦也是命中注定，成了第一位死于外国旗帜之下的美国总统之子。”麦特·范布伦死于巴黎。当时，他正在寻求从那折磨了他一辈子的疾病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史密斯·汤普森·范布伦，是根据他父亲的一位密友、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史密斯·汤普森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在一种充满了政治阴谋以及关于他父亲范布伦总统能力如何的不断争吵的气氛中长大的。并不像他的名字指望的，史密斯避开了司法领域，而把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用在保护他父亲和哥哥约翰上面。他由于在欧洲搞的恶作剧而变得举国皆知。但是，有时候，史密斯·汤普森也成了政治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特别是有鉴于他享有一个紧握着拳头、非常好斗的人的声誉，情况更是如此。

他自己从来不是任何公职的候选人，但是他确实参加了为数众多的政治集会，在那些场合，他代表父亲所采取的那些激烈政治活动是十分著名的。范布伦这个最小的儿子，对当时的许多

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看法是很有见解的。他在父亲的总统任期内非常起劲地为父亲工作。史密斯通过起草和准备各种讲话稿和文件，对父亲提供了切实的帮助。

人们对史密斯的私生活知之甚少，虽然他结过两次婚，养了7个孩子，但是他在历史上造成的影响，却在于他在其父担任总统时所干的那些东西。史密斯比他父亲多活了14年，他编辑和完成了他父亲关于政党发展的论文。由于他在使我们了解范布伦总统任期上所做出的不可估价的贡献，可以认为，美国历史上有些事物打上老范布伦的标记，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他。

三、从国务卿 到副总统

29岁时，范布伦以民主共和党员身份当选为纽约州议会参议员。作为民主共和党人，他是1812年战争的主要支持者，雄辩地发表赞成该州战争措施的演讲。他维护债务人的利益，是国内最早提倡废除因债务而坐牢的政治家之一。范布伦谴责“不是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不是因为他们对轻信和轻率的人们的诈骗……而是因为他们生为穷人的不幸，因为他们不能满足某些贪得无厌的债主的无底欲望”，就监禁人的制度。他还从事反对诈骗性银行业务的活动。1815年，范布伦被任命为州首席检查官，在这个职位上呆了4年，同时继续担任州参议员。他与本杰明·巴特勒、威廉·马西等人一起组成奥尔巴尼摄政团，这台有效的政治机器在许多年中控制了纽约州的政治。由于范布伦掌握了纽约州复杂的政治内幕，就成为这一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在1821年，范布伦参加了纽约州第三届宪法会议，在会议中他领导

破除了民众选举权中长期形成的种种关卡，和改革州法律的其他障碍。

由于范布伦的帮助，前联邦党总统候选人、他的朋友鲁弗斯·金当选为美国参议员。1821年他39岁生日的前两天，他也进入了国会，和鲁弗斯·金在一起，成为纽约州浅资历的参议员。1822年，范布伦在参议院发表首次演说，指责路易斯安娜州一次土地交易中的舞弊行为，因为过于紧张，讲到一半突然僵住了，无法继续说下去。他极其窘迫地倒在座位上。几周之后，他恢复了自信，后来成了参议院引人注目的成员，现代民主党的设计师和杰斐逊共和党的继承人。参议员范布伦反对门罗总统企图引诱联邦党人加入共和党。他爱惜杰斐逊式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没有受到诸如国内改良措施、损害州权利的强大中央政府联邦计划的污染。他相信严格的党纪，不倦地工作，尽管徒劳无益，也为保存作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工具的决策会议而努力。作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直言不讳地批评最高法院，尤其认为它的法院复审惯例令人讨厌。在1824年的总统竞选运动期间，范布伦支持威廉·克劳福德，即使在这位佐治亚人中风后，仍支持他当总统候选人，而克劳福德未能获选。在随后的4年中，范布伦成了参议院中反对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国家主义的领袖。在一次反对美国参加巴拿马大会的特具说服力的议会演说中，范布伦宣称，“我反对一切联盟，反对一切军事同盟或任何种类的同盟”。在1828年的总统竞选中，范布伦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因为他认为，这位田纳西战争英雄是唯一能够根据杰斐逊的原则统一国家的人物。他精神饱满地参加竞选运动，吸收克劳福德和约翰·卡尔洪以前的支持者，组成支持杰克逊当选的南北方联盟。

1929年7月，范布伦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在奥尔巴尼，范布伦州长发起《安全基金计划》，这是一次重大改革，有助于制止纽约州银行业的弊病。根据这个计划，各家银行应该拿出其固定比例的基金，建立一笔储备基金，这笔储备基金将用于收回任何一家破产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但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他从中活动，使纽约州的36张选举团票中有20张转投给安德鲁·杰克逊，因而使他当选总统。

范布伦只当了两个月州长，就辞职接受杰克逊总统的任命，担任了国务卿。他在不到100天内连续变动三项重要职务（即在1828年12月20日辞去联邦参议员，1829年1月1日就任纽约州州长，同年3月28日转任美国国务卿）。

范布伦和副总统约翰·卡尔洪都在争夺对民主共和党的控制权。为了讨好杰克逊总统，他甚至特意练习骑马，以便每天伴随总统在首都一起溜马。国务卿范布伦在政府内发挥重大影响。他鼓励总统利用政党分肥制，奥尔巴尼摄政团早已在纽约州完善了这种做法。正当“尹顿夫人事件”在华盛顿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他却和尹顿夫妇打得格外火热。范布伦是唯一服从杰克逊的命令礼貌地拜访佩吉·尹顿的内阁成员，从而巩固了与总统的已经很密切的关系，为此，杰克逊总统特别青睐他。1828年的除夕，杰克逊起草了一份政治遗嘱，内中说明万一他猝然逝世则预定的继承人选是谁。其中写道：

“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对范布伦先生的看法：我认为他完全符合我的心意，我相信他不仅是我信得过的人，也是全国人民信得过的人。反对他的人说他自私自利，诡秘狡诈；但我却说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诚实大方。作为一个咨议人员，他才能卓越，

审虑周祥。他也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能与人共事的人。他……完全有资格……得到人民的爱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关于卡尔洪先生，我本来也想同样地赞扬他，——大家知道，我过去曾经那样地信赖这位先生，然而现在我不想再提他了。”

杰克逊许愿一定帮助范布伦实现当总统的理想。由于所谓“尹顿夫人事件”，使总统和内阁成员间的关系弄得很不愉快。为谋求打开总统和内阁成员间的僵局，范布伦于1831年就辞去了国务卿的职务，为的是使“老山核桃”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卡尔洪的追随者们清除出内阁。军队部长尹顿随之也辞去职务。杰克逊趁机全部刷新内阁人事，调动反对他的三位阁员。杰克逊又给予范布伦驻英公使的任命作为酬报。但他刚刚到达英国，卡尔洪却操纵参议院否决了这项任命。这是因为1832年1月当这项任命提交参议院审议时，杰克逊和范布伦的政敌们都想趁此机会跟他们为难。他们合谋使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票数相等；这样就可以给副总统卡尔洪一个出气的机会——由他来投最后一票，否决范布伦的任命。卡尔洪投票后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下他就完蛋了，先生，彻底完蛋了。他再也抖不起来了，先生；永远抖不起来了！”可是，卡尔洪高兴得太早了。这个阴谋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反而使范布伦赢得了全国民众的广泛同情，因而杰克逊甚至还没等他的朋友范布伦从英国回来，就顺利地为他争取到1832年民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因为民主党内部有相当多的人反对提名范布伦竞选副总统，杰克逊的势力在1832年的提名会议上强制实行“三分之二规则”，确信只有范布伦才能掌握这样一个多数，他的对手一个也做不到。民主党人后来继续实行获得会议提名需要三分之二票

数的办法，直到 1836 年。杰克逊明确地选择范布伦作为副总统，以便范布伦能处于接替他的总统职位的更有利的位置。事实上，杰克逊曾认真地考虑过辞去总统职务，以使范布伦能不必忍受竞选运动的艰苦就执掌总统职务。然而，范布伦使他认识到，这种没有先例的做法会招致广泛的批评，使他的总统权力从一开始就遭到削弱。

1833 年至 1837 年，范布伦任副总统期间又成为杰克逊的心腹。作为副总统，范布伦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公开支持杰克逊，并且继续充任他的最亲密的顾问。尽管范布伦对杰克逊从合众国银行抽回联邦资金的计划感到担心，一旦决定做出，他仍全力支持。那个曾经否决他的驻英公使任命的参议院，现在原班人马都得归他领导，这样他算出了一口气，心中大快。1835 年暗杀杰克逊的阴谋败露之后，范布伦去参议院时经常随身携带两支手枪，以防不测。

四、魔术高手 以一胜三

1835 年 2 月，安德鲁·杰克逊无意第三次担任总统，敦促民主党召开提名大会，参加者应是“人民中新选出的代表”，由他们产生参加 1836 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偏爱：由现任副总统、纽约州的马丁·范布伦出任总统候选人，他是杰克逊最亲密的朋友和搭档；为使候选人名单平衡，副总统候选人由肯塔基州的理查德·M·约翰逊上校出任。约翰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是一位老资格的反印第安战士。他自称在泰晤士河战役中，曾经杀死了印第安人首领特库姆塞；他还要求给他有

黑人血统的女儿们以平等的社会地位，因而激怒了南方的贵族阶层。南方人对狡猾的纽约人——马丁·范布伦具有不信任感；但是他们更讨厌那位肯塔基的上校。尽管如此，最后杰克逊还是固执己见，毫不退让。5月，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时间，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在第一轮无记名投票中一致同意马丁·范布伦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理查德·约翰逊获副总统提名。在选举约翰逊时，弗吉尼亚的代表以“最粗暴的嘘声”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这两项选择都是即将退休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意旨。但对杰克逊的政敌来说，“范布伦会议”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完全是由“当权者控制的会议”，他们对此大加抨击，说它与以前的“国会提名协商会”是一路货色。他们指出，有的州并没有派代表参加巴尔的摩的大会，而另一些州所派的代表却被个别人包揽。田纳西州的代表没有一个是新从人民中选出的，而一位碰巧在巴尔的摩办事的田纳西人，却被获准参加了大会，同意把本州的15票投给了马丁·范布伦和理查德·约翰逊。他的名字叫爱德蒙·鲁克，在一段时间内，“鲁克化”成了政治允愿的代名词。休会以前，巴尔的摩会议发表了一个冗长的原则声明来取悦“老核桃树”范·布伦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许诺，要“完善他（杰克逊）已经光荣地开始了的事业。”

然而，并非人人都认为杰克逊的工作是辉煌的。联邦共和党仍然在银行问题上与杰克逊恋战，还在指责杰克逊反对高关税和国内改革政策有损于国家的繁荣。南方一些州权派的人物，曾经是“老核桃树”的朋友，现在也开始反目。杰克逊1833年全力反对南卡罗莱纳州不执行关税法的强硬立场，使他们转向坚定的

反杰克逊阵营。还有其他反对派，甚至在民主党内部也有对立面，他们认为，杰克逊过于专横了，他的行为正在破坏着政府三个部门间的宪法平衡。反共济会党，它们在 1832 年大选中曾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次，也准备把他们的票投给反杰克逊派的政党。1834 年，反杰克逊的各种力量结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同盟，在全国各地都有无数支持者，他们自称辉格党人。英国的老辉格党曾同国王的专制统治战斗，革命期间美洲的辉格党人也有同样的主张。新辉格党人形成于杰克逊的第二届任期内，决心同“安德鲁一世国王”作战到底。欢迎所有讨厌杰克逊的人们参加自己的队伍，即使是那些彼此也相互瞧不起的人士。最初，民主党人把这批由“联邦主义者、拒绝执行联邦法律者以及银行家们”组成的集团看成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位民主党人对范布伦说：“同这些人斗我们毫不费力”。然而，辉格党人 1836 年的战略实际上却真叫杰克逊派担心。

1836 年，辉格党人的组织过于松散，无法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拿出一个单一的候选人名单。于是，党的领袖们采取一种策略，让好几个辉格党候选人在其最受欢迎的地区竞选总统。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范布伦的选票达不到多数，然后，如同在 1824 年竞选那样，迫使总统选举转到众议院进行，再在那里联合举荐一位辉格党人总统，接替杰克逊。就像尼古拉·比德尔所说的那样：“这一病症被作为地方尖调症治疗——使用地方的药物”。亨利·克莱深知，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击败马丁·范布伦，便积极支持这种多候选人的战略，以此作为击败杰克逊的唯一希望。所以，辉格党人最后举荐出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是 1835 年和 1836 年由各州议会和群众大会中产生：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

尼尔·韦伯斯特，他是克莱的“美国制度”的支持者，与反共济会党关系密切，能在新英格兰地区获胜；田纳西州参议员休·怀特，一个狂热的州权派，他在南方势力很大；还有俄亥俄州的威廉·亨利·哈里逊，这位1812年战争的将军和印第安那准州的前州长，在三位候选人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辉格党人对范布伦的攻击毫不留情。在参议院，“小魔术师”范布伦以副总统的身份担任议长，亨利·克莱在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卡尔洪的配合下，使出浑身解数，给他制造麻烦，使其难堪。反杰克逊派的三巨头鼓动议会出现混乱，设法使每次表决都出现赞同和反对票各占一半的局面，迫使范布伦处在极其棘手的境地，很难决定自己的关键性一票必须投给哪方；甚至在范布伦没有投票就离开的时候，派警卫官把他追回来投票。但范布伦始终沉着冷静。“他的头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一位记者报道说，“仿佛一座弥勒佛，对于佛龕里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反杰克逊派的新闻攻击却异常尖锐。《纽约信使与问询报》则把他描绘成“一只潜伏在谷仓周围的狐狸，在地面下打洞的鼯鼠；是深海中的鲭鱼，在一个地方游弋，浮到另一处水面换气。”

范布伦的支持者们也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崇拜者，把他说是“新奥尔良的英雄”的最难得的继承人。他们同样攻击辉格党的各位候选人，把韦伯斯特说成是老联邦主义者，把怀特说成是忘恩负义的家伙，他背弃杰克逊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对哈里逊的画像是，1812年战争中的常败将军和印第安那准州的不称职的州长。他们还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为范布伦的竞选作了十分有效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们建立了州和地方的

募捐委员会，大量散发竞选材料，发行报纸，举行了无数的集会、野餐会以及宴会，用以推进范布伦的事业。而辉格党人方面，由于总统候选人有三个无法与其比拟，纽约辉格党人领袖瑟罗·威得叹息道：“我们会因范布伦当总统而遭殃。”

范布伦的目标是维护奥尔巴尼—里士满轴心，这一北方和南方政治机器的联盟是民主党从杰克逊时代到内战期间的基础力量。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在诸如经济政策和奴隶制等引起分裂的问题上既满足北方，也满足南方。北方的废奴主义者敦促他说明，在国会是否有权废除首都的奴隶制问题上他持什么立场，为此他发表了一个声明，措辞模棱两可地承认，国会的确拥有这种权力。但是，接着他很快补充说，他个人反对废奴，决心阻止对南方的奴隶制的干涉。尽管范布伦得到即将退休的杰克逊总统的有力支持，可这种支持也是令人喜忧参半。杰克逊因破坏合众国银行和反对某些国内改良措施，分别在东北部和西部极其不受欢迎。田纳西虽然是杰克逊的家乡，却不支持范布伦。范布伦的主要对手是威廉·亨利·哈里逊。哈里逊赞成将联邦剩余资金和出售公有土地的收益无条件地分配给各州；范布伦反对这种岁入共享的早期形式。哈里逊希望在经济失去控制时恢复国家银行；范布伦反对在任何情况下设立国家银行。哈里逊反映了西部要求实行国内改良措施的情绪；范布伦保证联邦政府只支持那些真正是全国范围的建设项目。

最终选择总统的不是民众的好恶，而是占优势的政治组织。选举结果，范布伦以 764198 张选民票（占 50.9%）和 170 张选举人票获胜，而他的三位辉格党人对手总计得选民票 736147 张和 124 张选举人票，其中哈里逊获 548007 张选民票（占

36%) 和 73 张选举人票；怀特获选民票 145396 张（占 10%）和选举人票 26 张；韦伯斯特获选民票 42247 张（占 3%）和选举人票 14 张。“他成为总统乃人心所向，”另一位纽约州辉格党人威廉·J·斯瓦德承认，“选民们所支持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们认为他所代表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民主制度”。哈里逊在此次竞选中成绩辉煌。多数辉格党人同意斯瓦德的说法，那就是，哈里逊将是下一次总统竞选中的“连任候选人”。

1836 年的大选，没有副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所以依法改由参议院选举。结果理查德·门特·约翰逊以 33 票当选。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参议院选举产生的副总统。

五、范氏政府 内外交困

在范布伦的就职典礼上，杰克逊喧宾夺主，成为人民欢呼的对象。正如当年华盛顿在亚当斯的就职典礼上，杰斐逊在麦迪逊的就职典礼上的光景一样。在范布伦的就职演说中，这位 54 岁的总统公然宣布，他将继续推行杰克逊的政策，他说道：

“我的前任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连续两次受到人民的神圣委托。他忠实而圆满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我也接受了这样的委托，担负这样的重任。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指望像杰克逊总统那样出色地完成这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和他的意见从未发生过分歧，我每天亲眼看到他以无比的忠诚和热情致力于祖国的繁荣富强，我赞同他所有的观点，这些观点也是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我有幸能得到他极大的信任，因此我希望在我前进的道路上也同样能得到人民的赞许。”

范布伦留用了杰克逊的所有阁员，这进一步证明了他准备保守成业的意图。

在就职演说中，范布伦自豪地说：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最繁荣昌盛的社会。可是，两个月以后，许多银行停止了纸币的金银兑现。1837年经济恐慌的阴云迅即笼罩全国。经济大恐慌发展为一直持续到1843年的严重经济萧条。这次大恐慌主要是由汇聚在一起的3种因素造成的：《使用金属通货公告》的颁布以及随之产生的信贷紧缩；农作物收成连年减产；与英国的贸易逆差。随着情况的恶化，全国各地大约有900家银行倒闭，在一些城市，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哄抢食品的骚乱。

1837年9月，范布伦召开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金库制度，使联邦政府能够直接掌管征收的税款，不必存入私人银行。他还建议政府以国库券的形式发行纸币。他警告国会说，国会没有宪法规定的权力，“向公民提供特殊补助，以解救他们由于商业和信贷的波动而造成的损失和困难”。当时，他提出的理由是正确的。他说：“各个社会团体往往会向政府提出过多的要求。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虽然权利和义务都是严格限制的，人们还是容易提出过多的要求。尤其当我们面临突然发生的困难和恐慌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的无比优越的宪法是宪法的拟订者和批准宪法的人民按照准确的原则，经过周密审虑而制订的。他们非常明智地指出：政府对私人业务干涉越少，则对于社会普遍繁荣的推进越多。所以，政府的合理目标并不是要使某些人富有，也不能对某些企业所遭受的私人损失给予金钱上或者立法上的直接援助。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用一部分人的财产为另一部分人谋利益。”国会行动迟

缓，过了很久以后，才采纳了范布伦提出的各项措施。独立金库制度到 1840 年 7 月才最终成为法律。虽然在 1839 年底至 1840 年初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好转，但是到范布伦任期后期，经济形势又开始恶化。这次经济衰落一直持续到 1845 年。经济崩溃是范布伦 1840 年竞选连任总统失败的主要因素。

在对外关系方面，范布伦政府对于加拿大边界上不时发生的武装冲突感到十分头痛，但他成功地避免了对英国或加拿大在边界问题上的大规模战争。由安大略的威廉·麦肯齐领导的加拿大起义者进行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在企图攻占多伦多受挫后，起义者撤到尼亚加拉河中的海军岛，在那儿建立了为独立的加拿大斗争的流亡政府。同情这次革命的美国人用卡罗琳号轮船向该岛运送补给品。1837 年 12 月，加拿大民兵根据英国的命令，在美国水域扣押了卡罗琳号，放火烧它，并让正在燃烧的这条船撞向尼亚加拉瀑布，死了一个美国人，伤了若干人。在致国会的一份咨文中，范布伦总统指责这次事件是“性质非常严重的暴行……激起了我们在邻近地区和整条边界线上的公民们最强烈的憎恨情绪。”尽管他下令美国军队开往该地区，但他抵制要求与英国开战的呼吁，并发表一项声明，宣布在涉及加拿大起义者的问题上保持中立。1840 年，加拿大人亚历山大·麦克劳德因谋害在卡罗琳事件中死去的那个美国人而在纽约被捕，但后来被宣告无罪。

英美关系因阿鲁斯图克战争而进一步恶化。美国缅因州与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之间的边界从未确定过。美国和加拿大都声称阿鲁斯图克河沿岸大约 12000 英亩的土地是自己的领土。1839 年 2 月，加拿大当局逮捕了美国人鲁弗斯·麦金太尔，指

控他企图将加拿大人驱逐出这片有争议的地区，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于是升温。麦金太尔是奉缅因州官员的命令行事。双方都立即在边界沿线集结了自己的民兵，并寻求各自政府的支持。就像在卡罗琳事件中一样，范布伦总统抵制与英国开战的呼吁，并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前往这一争议地区执行和平使命。斯科特有效地平息了这次危机，直到1842年《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的签订最终解决这个边界问题。

范布伦竭力设法维持南、北双方的现状，而结果却引起了双方的不满。反奴隶制的一方攻击他支持对佛罗里达州的塞米诺尔族印第安人进行战争。在杰克逊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期间，以酋长奥西奥拉为首的塞米诺尔人对从佛罗里达被强迫迁移到西部进行武装反抗。范布伦因继续执行杰克逊的印第安人政策而被批评，认为这场战争会促使佛罗里达成为蓄奴州。而拥护奴隶制的人却指责他没有尽快地合并得克萨斯使它成为一个新的蓄奴州。得克萨斯在1836年一场血腥革命的未了从墨西哥赢得独立之后，便要求获得美国州的地位。北方人普遍反对归并，担心合众国增添又一个蓄奴州后的全国性影响。南方人和西部人赞成归并，范布伦总统长期以来赞同南方的看法，认为奴隶制问题完全是一种地方性事务，不适宜进行全国性讨论，但这一次却站在北方一边。他反对德克萨斯的归并，因为这会有激化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危险，并且加深国家内部地区倾轧。得克萨斯最终于1845年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由于白宫以外的政府工作人员集会抗议，在范布伦亲自领导下，第一次对政府人员的工作条件作了普遍的改革，他将联邦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缩减到每天10小时。

六、连任竞选 失策败北

马丁·范布伦的崛起颇为惹人注目：美国参议员、纽约州长、国务卿、驻英公使、副总统，以至最后当上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 16 年间达到的。他选择的政治朋友都不错。他与安德鲁·杰克逊携手合作后，前途就有了保障。杰克逊使范布伦成为副总统，并在 1837 年提名他为民主党候选人。

但范布伦缺乏杰克逊的感召力，因此当 1837 年的经济恐慌发生后，他的声望便消退了。虽然他有足够的力量在 1840 年的民主共和党大会上一致被推举为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以竞选连任，但却根本不是年迈的战争英雄威廉·亨利·哈里逊的对手。民主共和党的代表们对于副总统候选人的人选意见不统一，只好决定由选举人直接投票选举。这种异乎寻常的决定，更使范布伦处于困境，因为他会因此而得不到一位能孚众望的竞选伙伴来支持他。而在另一方面，所有反对他的势力却在辉格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逊的周围团结起来了。1840 年的竞选异常激烈。为了把马丁·范布伦赶出白宫，并让哈里逊荣登总统宝座，辉格党人简直是不择手段。

在主要竞选议题上，辉格党人曾显得有些犹豫不决。1839 年 12 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绕过了亨利·克莱，选择哈里逊为总统候选人，这时，《巴尔的摩共和党人报》兴奋地报道了克莱的一位朋友对辉格党总统候选人的评价：“给他一桶烈性果酒，每年 2000 美元的津贴，我敢说，他会待在木屋里消磨剩余时光，坐在火炉旁，潜心研究道

德哲学。”辉格党人的领袖们马上把这一讽刺转变成竞选口号，把哈里逊说成是木屋—烈性果酒候选人，他与傲慢的马丁·范布伦不同，平易近人，朴素无华，实事求是，来自人民，听从人民，服务人民。民主党指出首先进行诬蔑和诽谤的是辉格党而非民主党，对此，辉格党人充耳不闻。他们中有人承认：“激情和偏见，如果恰当地激起和指导，能够在党派斗争中起到原则和理性那样的作用。”木屋和烈性果酒很快成为他们反对范布伦的主要象征。哈里逊也被描述成为一个住小木屋，喝苹果烈酒的平民领袖。辉格党人不仅仅要使哈里逊民主化，而且还要使范布伦贵族化。在他们结束工作以前，这位高贵荣耀的忠诚的民主党绅士，已被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势利小人形象。他们发表演讲，痛斥范布伦用国家财产建立“皇家建筑”，它如同“凯撒的宫殿一样宏伟壮观，”“像亚洲皇帝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辉格党人把范布伦说成是用金盘玉盏宴饮的“金德胡克的老狐狸”。

这种策略很有效，范布伦终于被击败了。

哈里逊的胜利是预料之中的事。艰难时世极大地损害了范布伦的事业，而辉格党的蓬勃发展则预示着哈里逊将入主白宫。1840年10月末，选举结果刚开始统计，就已经显示出，哈里逊将是下任美国总统。他的选民票在选举结束时统计，只比范布伦多145000，（1275612对1130033张），但他得到的选举人票却是压倒多数（234票对60票），在19个州获得胜利，而范布伦只赢得7个州。

七、离任生涯 数争无成

范布伦对失败比较坦然，这或许是因为他才 58 岁，相信自己能够东山再起。他返回纽约州北部的老家，沿途受到热烈欢迎。纽约市约有 8000 人出来欢呼他的归来。

他的财富使他能够过乡绅的生活。几乎从回到家里的那一天起，他开始不间断地给全国各地政治家写信。他不希望被人遗忘，尽管他对邻居表示：“我是来和你们做终生邻居的。”他买下彼得·范内斯的地产，包括一个 200 英亩的农场和一座 30 间房屋的宅第。然而在一个月內，一系列事件就转变了范布伦的想法。哈里逊死了，同年早些时候，民主党重新控制了纽约州议会，范布伦的支持者夺得最大的硕果。这使他处于再次争取总统提名的有利地位。他原想党内同仁会登门拜访和讨教，然而并无人来。他很快意识到；他必须出门寻求支持。他到田纳西州拜访良师益友安德鲁·杰克逊。不过这次出门还有一个意图，他想去肯塔基州拜会亨利·克莱。如果说，范布伦尚有争取 1844 年民主党提名的优势，克莱几乎无缘得到辉格党的提名，而他们的两天会谈将一劳永逸地终止他们当上总统的机会。

1844 年竞选的争论焦点是要不要把得克萨斯共和国并入美国。这是一个爆炸性问题。北方有许多人反对并吞，认为这是把另一个奴隶州并入合众国，而其他一些人则担心这样做会导致与墨西哥打仗。

因此，不管候选人站在哪一边，他总得失去一些支持。克莱和范布伦达成了一笔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政治交易：双方对这个问

题都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只要不谈这个问题，它就难以成为竞选的主题。当 1844 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临近时，里士满的一家报纸发表了杰克逊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他支持并吞得克萨斯。范布伦必须作出抉择：要么追随那个使他成为总统的人，要么坚持与克莱达成的协定。结果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与克莱一道发表反对并吞得克萨斯的公开信。杰克逊立即抛弃了范布伦，并通知他的支持者，说他赞成提名一个支持吞并的候选人。

克莱与范布伦的“交易”激怒了坚决主张合并得克萨斯的杰克逊，他终于动用自己的力量，施加影响以反对范布伦，而成功地使詹姆斯·波尔克获得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尽管范布伦仍然得到半数以上的代表的支持，但无法获得提名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范布伦渐渐失势了。

他掩饰了失望情绪，为波尔克进行竞选。他希望在这届新政府方面获得影响，然而却再次陷入失望。他要求波尔克把几个关键的政治职位给他的支持者，没想到空手而归。波尔克确实把一些次要职位给过范布伦的追随者，但愤怒的范布伦叫他们别接受。

每一位总统都会有一个意识到权力明显消失的时刻。对大多数总统来说，这个时刻就是选举结束的一天，其余的总统则是在继任者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感觉到的。范布伦的感觉时刻与众不同，他是在指示支持者不要热爱波尔克政府的职位时才感到权力丧失的。但他的支持者们也知道，范布伦作为民主党的实权人物的时期已经结束，因此争相接受了波尔克给的职位。

波尔克最希望的是把范布伦撇开。他提出让这位前总统担任老职务——驻大不列颠公使。但范布伦看透了他的用意。事实

上，范布伦为了排除德威特·克林顿的政治势力，也曾使用过同样计策，向他提供过同样职位。就像克林顿过去所做的那样，范布伦也拒绝了这个职位，仍然希望有朝一日他还能夺回白宫。

然而，范布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现象的牺牲品，这个现象产生于杰克逊执政时期，一直延续到亚伯拉罕·林肯的当选。克莱·约翰·卡尔洪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等人的政治主张都是人所共知的，尽管他们都有做总统的能力。但他们的主张都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立场强硬就有失去北方或南方支持的风险，而政党也会转向那些政治观点不明朗的人。范布伦在吞并得克萨斯问题上表态之前，也属于观点不明朗者。范布伦在全国政坛上遭到冷遇后，回到纽约政界，那是他早年投身政治的地方。他一旦公开反对并吞得克萨斯州，便再难改变立场，而他对扩大奴隶制范围表示激烈反对时，也就没有可失去的了。他的政敌和那些支持扩大奴隶制范围的人说，他是用烧谷仓办法来消灭老鼠。因此，他和他的追随者被叫作“烧谷仓派”。这个绰号暗着他们愿意看到国家在奴隶制问题上陷入火海。范布伦告诉朋友们：“奴隶制将会在可怕的动乱中结束，我担心这一点，但它总要来的。”

波尔克认为范布伦运动威胁了民主党前途。便采取行动削弱“烧谷仓派”的阵营。他开始向范布伦支持者提供政府职位，拉走了他的部分中坚分子。但范布伦保住了足够的实力，1848年，他派出一个代表团出席在巴尔的摩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拥护总统的民主党人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党为防止分裂，决定让两个代表团都选出一个候选人，但“烧谷仓派”不愿将其候选人与总统派候选人并列，所以退出了大会。

范布伦的支持者成立了自由土地党，并提名前总统为候选

人。民主党提名密歇根州的刘易斯·卡斯为候选人，辉格党选举原军事领导人扎卡里·泰勒为候选人。

致力于消除奴隶制的范布伦新党虽然不可能赢得大选，但范布伦总算向反对他的党报了仇。他只获得 10% 的选票，不过这些选票倒是来自民主党所依赖的那些州。范布伦的新党使辉格党重新入主白宫。美国历史上有三位前总统试图通过第三党势力夺回白宫，范布伦是第一位（其余两位是 1856 年的米勒德·菲尔莫尔和 1912 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这三人中，范布伦得到的选票百分比最小，但他与罗斯福一起产生过最大的影响作用。

此时范布伦自己也明白，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在 1852 年的大选中，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是当时已 66 岁的范布伦的最后一次奋争。此后，他退出公共生活，回到林登沃尔德庄园过宁静的生活。

林登沃尔德庄园位于纽约州金德胡克，包括一幢有 30 个房间的砖砌宅第和一个有 200 英亩土地的农场。自从于 1841 年离开华盛顿后，他尽情享受乡绅的生活，即使在策划政治上的重振旗鼓时也不例外。他喜欢照管田头的马铃薯，钓鱼，以及与金德胡克的老朋友们一起度过白天的时光。

1853—1855 年，范布伦周游列国。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最后定居于意大利的索伦托城，开始写回忆录。回忆录是这样开头的：“在 71 岁之际，在一块外国的土地上，我开始勾划自己一生中的主要事件。”他对一个朋友说，他写这本书是“为我的政府辩护”。

他还着手写一部美国党史。1856 年，他的儿子马丁死了，范布伦返回美国，他的写作计划也随之告终。

1856年，他重返民主党以支持詹姆斯·布坎南，但他的支持并不是布坎南当选总统的因素。他已成了被遗忘的人，他的政府则被斥之为政治倾向太强和错误太多。

1862年，范布伦79岁，身体极虚弱，只能坐在椅子上度过时光。在最后几个月中，范布伦的支气管哮喘病严重发作，身体日益衰弱。在与儿子们交换了最后几句话后，他陷入昏迷，并于7月24日凌晨在林登沃尔德逝世。

范布伦的葬礼在金德胡克的荷兰改革派教堂举行，根据他的遗愿，葬礼上没有鸣钟。大约80辆马车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在金德胡克消防队护卫下，从教堂缓缓地前往金德胡克村公墓。在公墓的范布伦家族墓区，范布伦的花梨木灵柩被放进木制棺椁，随后葬在他妻子旁边的墓穴中。根据他的于1860年生效的遗嘱，他的价值约225000美元遗产由3个健在的儿子均分。

纽约市长吉格雷·奥普代克在范布伦逝世后，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他的纯真的品格，他的作为政治家的杰出才能，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以及他的已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成绩卓著的公职生涯，使他的名字值得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